

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

——兼答安井三吉教授

曲家源

内容提要 针对日本神户大学安井三吉教授关于卢沟桥事变“偶发”说的观点,本文认为,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当年的华北日军肯定有一个策划过程,这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在我们已知的历史资料中,能够证明日军有“谋略”的资料比强辩他们“无谋略”的资料更有力更充分。安井教授完全不顾及这些重要的事实,而把一系列按既定计划采取的行动和计谋败露后蛮横提出的无理要求,都从整个事件过程中分离出来,说成是“偶发”的,无法让人接受。本文对有关史实重新作了系统论证,证明卢沟桥事变是以当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班为主的阴谋分子精心策划的产物。

关键词 卢沟桥事变 “偶发”说 日军谋略

—

自5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出现为过去的侵华战争辩护的文章和言论。有些人不承认那场罪恶的战争是侵略。他们用来作为论据的,主要就是说作为全面侵华战争起点的卢沟桥事变“不是”日本有计划发动的。它是在日本“无准备无计划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点燃的”;日本为了“自卫”才被迫开战。近年来,此种否认侵略,进而否认侵华罪行,为过去的战争罪犯评“功”摆“好”的言论有愈演愈

愈烈之势^①，让人有过去那种灾难在某些人心中还在继续之感。

卢沟桥事变本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计划的产物，是当年驻华北的日军用卑鄙手段制造的阴谋事件。但在日本，却有相当多的人否认有这样的阴谋计划，说它是“偶发”的。更有甚者，一些人把它说成是“中共计划”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已写了不少文章对日本军人策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进行论证。近几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对日本否认“计划”的谬论进行了反驳。^②

日本神户大学安井三吉教授1997年发表一篇《卢沟桥事件再考——围绕中国的“日军计划”说》的长文^③，全面地对中国方面“日军计划”说进行了考察和反论，特别是用大部分篇幅对我的几个观点提出了疑问。我曾拜读过安井教授过去发表的有关卢沟桥事变研究的大部分论著^④，与那些论著相比较，感到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点：

- ① 此类公开或隐蔽的言论不少，可以自称“评论家”的冈野笃夫《关于日中战争是否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问题的探讨》（载《日自由》1994.8）为代表。笔者在撰写本文时又听到东史郎《日记》案败诉和过去以否认侵略出名的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并立即发表反华言论事件。
- ② 我写的文章主要有：《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山西师学报》1987.2）、《对“一士兵失踪”的考证》（《近代史研究》1991.3）、《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争论》（1995.5）、《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共产党》（1997.7）等。这些文章均收入笔者的《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卢沟桥事变史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两本书中。
- ③ 载《日》《东洋史研究》第55卷4期，1997年3月出版。
- ④ 安井三吉有关卢沟桥事变的论著主要有：《关于卢沟桥事件的一项考证——围绕“一士兵失踪”问题》（日《东洋史研究》1989年9月）、《卢沟桥事件与国民政府》（《中日战争与文学》，东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人们印象中的卢沟桥事件——在中国、在日本》（日《日本史研究》1994.3）、《关于卢沟桥事件的“中共计划”说》（日《中国季刊》1994.6）、《卢沟桥事件》（研文出版1993年版，该书1993年在香港又出版了中译本）等。

(一) 此文对历史资料的考察更加细密。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侵略借口,惯用贼喊捉贼的伎俩把侵略行动归罪于被侵略一方。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在7月11日发表声明,称:“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①且不说中国人民在自己本国土地上抵抗外国的武装侵略有何罪过,当年日本政府的是非观念已颠倒到何等程度,就说“中国方面有计划”一句,就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安井教授详细考察了事变发生时日方的主要当事人牟田口廉也的手记回忆录。牟田口是日军驻北平第一联队长。当时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不在北平,牟田口还兼任代理警备司令官,成为北平地区日军的最高军官。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一士兵失踪”的报告后,就是向他请示出兵的,后来日军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开炮攻击也是他下的命令。1941年他已升任陆军中将,写了一部《华北作战史要》的回忆录(藏日本防卫研究所),其第1章对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的情况和他的判断有详细记述。安井教授认为:与日本政府声明的看法相反,“现场的支那驻屯军领导者并没有认为事件起初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事件,还是把它看成‘偶发’性事件来采取行动。”^②接着,安井列举了牟田口判断的依据:在牟田口命令一木大队出动的同时,还命令日宪兵分队长赤藤在次去侦察中国方面的要人及驻军情况。8日凌晨2时半左右,赤藤报告:“支那部队及要人住宅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牟田口写道:“这个汇报成为联队长及代理警备司令官下定重大决心的基础,即断定此次事件绝非支那方面有计划的行为,完全是卢沟桥附近局部地区的突发事件。”(第108—109页)

①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第366页。译文引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7页。

② 安井三吉:《卢沟桥事件再考》,第108页。以下引安井文同此,只注页码。

既然是非计划行为,牟田口为何还要攻击中国军队呢?安井引述道:

最近联队长的心情是这样的:鉴于去年丰台事件的经验,支那方面对日军的敌对行为是不容宽恕的,有必要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正如先前判断的那样,这次事件并不是支那方面有计划的行为,而是一起局部事件。但是借此良机正可以给支那军以铁锤般的打击,借以收拾局面从而宣扬皇军的威武。

(第109页)

安井认为,牟田口是在否定中国有“计划”的情况下下达“开始战斗”命令的。他说:“37年7月8日下达向中国军队‘开始战斗’命令的人,对当时状况的认识在4年后还没有改变。面对卢沟桥事件是否‘支那方面有计划的行为’这个问题时,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原有的看法。”(同上)由此说明日本政府所谓“中国方面有计划”,纯属不根之谈。这样的论述是令人信服的。

(二)此文中的立论态度更加明朗。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性质和影响(意义),中国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而日本方面虽然大多与中国对立,不承认是日军计划,但他们之间众说纷纭,分歧也是很大的。安井教授在文章开头即明确自己总的观点是:

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性质,也可以说是日中战争的性质,问题归纳为是日本的侵略战争还是日本的自卫战争,我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一观点现在日本国内还有对立意见,冈野笃夫先生针对拙著《卢沟桥事件》同我展开了争论。

(第105页)

具体地说,安井把他的观点分列为四项:

1. 日中战争是日本的侵略战争。
2. 日军在卢沟桥事件前有过“武力占领华北计划”;有武力占领华北的构想。

3. 卢沟桥事件的“发端”是“偶发”的。“日军计划”说是不正确的。

4. 使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全面战争, 责任在日本方面。(第 106 页)

除第 3 点外, 我认为其余几点都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因而是最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包括第 3 点在内的这 4 个观点, 把问题表述得明白透彻, 毫不含混, 为近年来少见, 虽然不能说是安井教授的独到见解^①, 但这是在日本现在关于卢沟桥事变和侵华战争的性质激烈争论中提出的, 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三) 此文对与中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得更加明确, 这就是以上第 3 项观点所表述的。

二

在安井教授开列的他的 4 个基本观点中, 其第 3 项: “卢沟桥事件的‘发端’是‘偶发’的”, 是针对中国提出的。这篇文章看重讨论的也是“偶发”问题。但是, 卢沟桥事变的“发端”是谁“偶发”呢? 是日本方面“偶发”, 还是中国方面“偶发”呢? 在 2 万多字的论述中, 安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通过他的论述, 特别是通过他引述牟田口《笔记》的话: “这次事件并不是支那方面有计划的行为, 而是一起局部事件”, 我们不难明白他的主张, 即, 卢沟桥事件的发端既然不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行为, 那就只能是中国方面“偶发”

^① 早在 70 年代, 日本史学前辈井上清先生、藤原彰先生等就明确发表过类似见解, 见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 3 册第 264 页,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中文版; 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 3 卷第 58 页,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中文版。

的行为。

安井教授是肯定“第一枪”的存在的,又肯定这“第一枪”不是日本所放,那么,在中国的卢沟桥,除了中国人还能有谁呢?安井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结论。其实,“偶发”问题不可能发生在日本方面。日本方面只有一个可能:计划。日本学者要回避“日本计划”而坚持“偶发”说,只能归于“中国偶发”。

说中国方面打“第一枪”有确凿根据吗?没有。但安井并没有说出“也不可能是中国人开的枪”这样的话。所以安井的“偶发”说,如果不是想暗渡陈仓,栽脏中国,就是自相矛盾,自己否定自己。

自60年代今井武夫出版《中国事变之回忆》,制造谣言,胡乱猜测种种中国人放“第一枪”以后,许多日本学者都把其“偶发”说建立在中国方面,但他们至今没有拿出一项确凿的根据。1987年,我在《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中就提出:“第一枪”真的吗?如果确实有,谁放的?他为何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放枪?谁需要这几声既击不着日兵又徒惹麻烦的空洞的枪声?我们现在能确知的只是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听到了枪声,到底是几发、十几发或几十发,都是日本人说的,这枪声为何不能是日本军人自己所放!但是日本学者,包括安井三吉教授都避免回答这些问题。

1999年3月,香港出版了安井教授《卢沟桥事件》的中译本,安井为此书写了一篇《补论》,其中在谈到“第一枪”时针对我的提问,他说:

7月7日的所谓“第一枪”也只能用“声音和光”来确定。因此,必须依靠看到、听到人的证言。的确在有关证言中,对时间、方位、数量等存在着很多矛盾之处,但要证明他们(中队长清水、小队长野地、分队长长泽等)的话都是胡说八道,也非常困难。因此,对于谁开的枪,我只能认为还很难下结论(江口氏持“第二十九军开枪”论)。另外,研究卢沟桥事件的日本学者

多数也并不热衷于“第一枪”问题。^①

日本人要证明“第一枪”是中国人放的，在方法上存在一个自相悖反的矛盾：因为证明的对象是虚无飘渺的声音，证人少，不足以证明；证人多，证言又互相矛盾。安井教授承认日本的证言“存在着很多矛盾之处”。我想，对一个像“第一枪”这样简单的问题竟弄出“很多矛盾之处”，这还不足以证明他们“都是胡说八道”吗？难道谎言说多了就能变成事实？另外，说“日本学者多数也并不热衷于‘第一枪’问题”，也不符合实际。在日本，记述、研究“第一枪”的论著虽不能说汗牛充栋，至少也是连篇累牍，像秦郁彦、江口圭一这样一些研究卢沟桥事变的知名学者都是热衷散布“第一枪”奇谈怪论的名手。而且，多数日本学者主张的“偶发”说，就是建立在“第一枪”这一虚构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不先谈“第一枪”，“偶发”说又从何谈起呢？

多年来，不少日本学者都热衷谈论“第一枪之谜”，以此来转移人们的视线，达到掩盖日军有计划发动卢沟桥事变真相的目的。但从前所谓的“第一枪”，都是指7月7日晚10时40分清水节郎在中队演习告一段落准备收队休息时听到的“枪声”。这次安井教授在“第一枪”上又作出新文章，提出新观点，他说：

卢沟桥事件能成为“事件”，其核心部分应该是从传令员到达丰台（7日午后11时56分）后一直到8日午前5时30分日军开始投入战斗为止这一过程。事件的主谋是一木大队长和牟田口联队长。（第121—122页）

安井抱怨我“对这一阶段不太重视”。他说：“与曲氏相反，我却认为这一阶段才是‘事件’扩大为实际军事冲突的分界点。可以说我是站在比较重视这一阶段的立场上的。”（第122页）这一阶段有何值

^① 安井三吉：《卢沟桥事件》，香港科华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30页。

得重视之处呢?他认为,卢沟桥事变能够发生的关键是一木清直在8日午前3时25分听到的“三发枪声”。他说:

站在“计划”说的立场上,曲氏认为日军在演习之前就抱有“告领卢沟桥的目的”,所以对交涉要求依据变化的意义、下达向中国军队“开始战斗”命令的过程,尤其是8日午前3时25分的“不知在射击什么”,“听到从龙王庙方向传来的三声枪响”,即从再度“发炮”事件开始到4时20分牟田口向一木下达对中国军队“开始战斗”命令的过程等等,几乎没有表示出关心。但是问题是很微妙的。如果弄清这个过程的话,就会明白为什么日军开始向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了。(第122页)

确实,我对一木所说的“三声枪响”是不重视的。如果说清水节郎所说的“第一枪”可能没有也可能有的话,那么,一木所说的这“三声枪响”就可以肯定是他为了执行既定计划,制造攻击卢沟桥城借口而临机编造的。因为,从当时现场情势看,卢沟桥中国守军已奉命检查了枪弹情况,清楚知道日军正在为放枪事与冀察政权交涉,且大队日军已在城外列阵寻衅闹事,不会甘冒军法处置的危险去放枪,第三者敌对双方严重对峙状态下潜入放枪更不可能,那么,这3时25分的“三发枪声”从何而来?而且,在一木所说的“三发枪声”稍后不久,即8日凌晨4时,中方代表王冷斋、林耕宇已赶到卢沟桥城外日军阵地上,负责调查“放枪”和“日兵失踪”事件,一木清直、森田彻俱在现场,他们威胁要求王、林二人的只是允许日军中队武装进城问题,被王冷斋严辞拒绝,而根本没提过什么“三发枪声”问题。所谓“三发枪声”只是在日方“士兵失踪”计谋流产、武装进城企图受挫以后,一木恼羞成怒于4时23分向牟田口请求开战时编造出来的借口。这借口虽是重复清水节郎的故伎,显得拙劣,但也是无法考察求证的最方便的借口。安井教授要把这么一个荒

唐拙劣的谎言当作研究的重点予以“重视”，我要说，那是搞错了方向，只会使研究走入歧途，不会得出什么结果。^①

三

安井教授的第3项观点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日军计划’说是不正确的”。

关于否认卢沟桥事变“日本计划”说，安井首先把这里所说的“计划”从概念上加以廓清。他说：

这里所说的“计划”，指的是1937年7月7日夜，抱着什么目的（武力占领北平或全中国，或者是日军同中国军交战的目的）发射了“第一枪”，或者由“一士兵失踪”而引起卢沟桥事件。虽然支那驻屯军司令部《昭和十一年度北支那占领区统治计划书》（1936年9月15日）等文件表示日方有武力占领华北的计划，但是，仅仅因为《计划书》的存在而把它作为日军“计划”说的直接根据是行不通的。我的观点是，问题的关键要看7月7日夜的“第一枪”、“一士兵失踪”事件有无具体的直接的“计划书”或“谋议”。如把它同1931年9月18日夜的柳条湖事件的“谋略”相比较，大家就会明白我的观点了。柳条湖事件的“谋略”性，并不是因为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在事件前策定过武力占领计划，而是根据具体的9月16日在奉天特务机关，石原、板垣等人和实行部队的川岛正大尉等开会“谋议”，并在第二天17日决定18日实行“计划”。18日夜，河本末守中尉以下官兵在满铁线路上实行爆破，与之相配合，设

^① 关于所谓“第二次枪声”问题，以前已有一些日本史学家作了研究考证，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不值一顾。

置在奉天铁道附近的关东军驻屯地内的 28 英寸要塞炮向沈阳城发射,开始攻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等等事实,而判断是有计划的。以上事实在战后参与策划的花谷正(当时的关东军参谋)等人都做了详细的证实。所以说,关于卢沟桥事件也涉及到是否有这样的“谋议”和准备,这也是它是否有“计划”的分界点。(第 106—107 页)

日本于 1936 年向平津地区大规模增兵。1937 年初即加紧军事训练和演习。这些虽然都是有计划的重要的行动,但都被安井教授排除在“计划”之外。日军训练和演习的情况和目的,安井引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日记》的记述:

……可是,虽然处理了意外事件,担负着重大的责任的第一线部队仍感到遗憾,他们的行动已疾风迅雷般神速,但仍有数次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全联队官兵加紧傍晚、黎明及夜间行动的训练,让每一名士兵都熟悉驻地附近的地形,熟练夜间行动。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北京驻屯第一大队对支那军首脑私邸、兵营、城门等的奇袭计划,驻丰台部队南苑及宛平县城(卢沟桥城)的奇袭计划。各干部多次互相实地踏查,根据该模型实施训练,或进行沙盘或图上演习,并校验其训练结果,细致周到地做好行动时编组装备等各项工作……从事变爆发后的战斗经过来看,深刻感到训练收到了很了不起的效果。(第 116—117 页)

安井对这段话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牟田口证言否定了有人说的第八中队在卢沟桥城外进行的“利用薄暮接近敌主阵地及黎明攻击”演习是针对苏联的说法,即,日军当夜的演习是以卢沟桥城为目标的。(二)《日记》所写把“支那军首脑私邸、兵营、城门等奇袭计划”的任务特派给“北京驻屯第一大队”,同时又决定了“丰台部队对南苑及宛平县城的奇袭

计划”。安井认为：“这就更明确了驻丰台部队的演习目标是宛平县城，即第三营。”（三）“《手记》中的‘根据该模型实施训练，或进行沙盘或图上演习’，明确对‘奇袭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做了周密的检讨”。（四）“《手记》中的‘从事变爆发后的战斗经过来看，深刻感到训练收到了很了不起的效果’，证明了事件前的演习在7月8日以后对中国军队的战斗中收到了实践性效果。”（第117页）

安井又举寺平忠辅《卢沟桥事件——日本的悲剧》中关于炮兵队长久保田尚平在7月8日晨5时30分向宛平城和回龙庙开炮时，发发命中，受到联队副森田彻的夸奖来验证牟田口所说的“实践性效果”；用7月8日凌晨3时天津驻屯军“军主任参谋起草”的《宣传计划（草稿）》中的“第二要领”：“一、诱导事态的基础工作。（一）监禁要人。（二）占领卢沟桥”来验证牟田口所说的两个“奇袭计划”。安井教授说：

可以认为，《宣传计划》是“奇袭计划”中的一个环节，预先起草了原案。为了适应7月7日“事件”的发生而做了一定的修改。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支那驻屯军司令部的《北支那占领区统治计划》和牟田口提到的对第二十九军的“奇袭计划”以及《宣传计划》，三者原本是一个整体。（第118页）

但安井教授接着说：

久保田和牟田口的证词有力地证明了在第一联队做好了对北平和南苑以及驻卢沟桥的二十九军的“奇袭计划”，但所有这些都成为7月7日实行“谋略”的证词。对于从7月7日夜到7月8日晨丰台驻屯部队的行动来说，牟田口所提到的两个“奇袭计划”以及日常训练确实起了作用，但并不能认为因为有那个“奇袭计划”才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开展战斗。（第118页）

安井教授对“计划”的确切含意指说得相当透彻,这也是我近几年同日本史家争论的主要之点。我认为指导7月7日夜日军从联队长牟田口到卢沟桥外演习的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的行动计划是有的。也就是说,7月7日夜至8日晨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并扩大之,是遵照一个事前密谋的计划进行的。我没有掌握这个“计划”的文本,但我知道有过这个“计划”。1991年,我根据已知的可靠的有关资料推测出这个“计划”的大致内容如下:

1. 利用第八中队在卢沟桥城外进行夜间演习之机,在演习中队后方放枪—
2. 派遣一名士兵走近中国军队阵地,制造“士兵失踪”事件—
3. 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失踪士兵”交涉—
4. 进城搜查,发现日兵或日兵尸体—
5. “膺惩”二十九军,占领卢沟桥—
6. 将二十九军逐出平津、河北,解决华北“悬案”。^①

日本爱知大学江口圭一教授在其所著《卢沟桥事件》中说:

1937年7月7日到8日在卢沟桥发生的事件,并不是由于事前的计划和预谋而发生的。清水大尉指挥的第八中队并不是以挑起事件为目的而去进行夜间演习。由于第三者的预谋而挑起的余地也不存在。在这一点上,与由于关东军参谋的计划预谋而发起的柳条湖事件不同,可以断定卢沟桥事件是偶发的事件。^②

我的看法同江口教授正好相反,我认为:

他看问题的角度不对。选择第八中队可能是偶然的,但选择“7月7日夜”却是日军“谋略”中的有意安排,是早已计划好的(按照日军训练计划,7月7日是夜战训练最后一夜,7月

① 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83页。

② 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37页。

10日进行检阅)。哪个中队在这一晚去卢沟桥演习,这个中队就担负挑起事件的任务。第八中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被挑选出来的。^①

对于我的这些考证和分析,安井教授说:

曲先生的“日军计划”说,是从“计划”说的角度对事件发生前日本方面的动向和事件发生的阶段及状况来推断的。他这种分析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是可以认可的。的确,7月7日也许是实行“谋略”最好的日子。^②但是,至今也没有发现准备在7月7日实行“谋略”的资料。(第114—115页)

安井承认我的推断是合理的,但又认为我是“从‘计划’说的角度来推断的”。那么我们暂且抛开“计划”,另换一个角度来看卢沟桥事变又该如何呢?

四

安井教授在大文的开头慨叹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中超出纯学术争论和范围,而“蒙上了国家的和民族的政治色彩”。由一位日本学者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难能可贵。因为近年来读一些日本学者

① 曲家源:《卢沟桥事变与全民族抗战》,见《伟大的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同心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140页。

② 安井在1999年3月香港版《卢沟桥事件补论》中从此点又发生倒退,说:“既然是日军实施‘谋略’,为何非在7月7日进行不可呢?8月9月为什么就不行呢?从当时的情况看,日军要想演习,在什么时间都可以进行。”(该书第230页)安井教授研究问题虽然细致,但缺点是总是孤立地看问题,所以常不得要领。在这里又犯了这个毛病。当年日军在华北横行无忌,确实,“要想演习在什么时间都可以进行”,但演习不是目的,华北日军急急要做的是制造事端以推动解决“华北悬案”。这个问题不能拖到“8月9日”。这只要看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章第7节“日趋紧张的事变前夕的形势”就可以明了。本文后面也将论及。

关于侵华战争史论著。总觉得里面有太多的捏造史实和强辞夺理,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蔑视,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科学。它要通过不断地挖掘探讨以求得逼近历史事实之真。而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主客观条件,有其发生、发展、结局的内在逻辑联系,即所谓的历史因果律。如果违背了因果逻辑,人们就会认为反常。安井教授也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过程中有一些事情是反常的,他把它们归纳如下:

7月7日夜“第一枪”的有无,谁发射的;志村菊次郎二等兵“行踪不明”的理由;是谁向丰台大队传达志村归队的消息;牟田口廉也第一联队长和一木清直第三大队长命令驻丰台部队出动的理由是因为“第一枪”还是因为“一士兵失踪”;牟田口和一木在“一士兵失踪”这一问题解决后还不撤兵的理由是什么;8日午前3时25分“发炮”射击的对象是谁;牟田口在4时20分向一木下达“开战”命令的根据是什么;最初的“第一枪”应理解为7月7日夜的“发炮”还是8日晨5时30分的“开战”;还有如何看待第二次丰台事件(1936年9月)。(第105页)

其实对这些问题日本史学家都有解释,但那些解释都太牵强,不合道理,没有一点能够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证,安井教授仍然把它们作为问题提出来了。一共9个问题。除最后两个属于判断问题与事实关系不大外,其余都是需要日本当事人回答、日本史学家来研究的问题。安井教授能提出这些问题,说明他主观上是要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些问题的。我们循着他的思路还可以提出一些类似的问题。因为,安井的这些问题都是从日本角度提出来的,如从中国方面来说,还可以提出以下这些:

1. 日军为什么在1936年制造两起丰台事件强占丰台?不知道丰台并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外国驻兵地,强占丰台是违犯国

际法吗?^①

2. 日军为何一定要到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卢沟桥也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外国驻兵地, 在这里搞军事演习也是违犯国际法的。他们不知道卢沟桥是当时平津乃至全中国最敏感的军事禁区吗?

3. 1937年5月底6月初, 东京政界流传“7月7日夜, 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促使日本政府和军部纷纷派员前往华北调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清水节郎中队长发现一士兵“失踪”后, 正常情况下的处置应该是先行搜寻, 搜寻不着, 确认失踪后再报告, 因为这是自己带兵的责任。但他却不经过努力搜寻即刻派人向上级报告, 难道他不担心上司的责备, 他自己也没有失职感吗? 这是否说明他不把“士兵失踪”当作自己失职, 而是按计划在完成一项任务因而急忙向上级报告?

5. 一木清直大队长是为“一士兵失踪”而率领大队出动的, 深更半夜跑了七八公里到卢沟桥, 却发现所谓“一士兵失踪”是假情报, 是由于己方管理不严造成的, 在关系紧张的两军之间发生这样的差错, 为何对责任者清水节郎没有批评和处分, 而是继续清水的错误判断坚持包围卢沟桥? 当年日本军队就是这样缺乏军纪约束和蛮不讲理吗? 这是否也是按预定计划从事呢?

6. 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 7月8日凌晨2时, 联队长派联队副森田彻到现场调查处理, 而在此时之前的1时稍过, 一木清直已赶到卢沟桥附近与清水节郎见面, 知道“失踪”士兵已

① 有几位日本侵略史学家曾替日本侵略军狡辩, 说“根据条约认可的权利”, 我曾对他们进行批驳, 详见《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第150—151页。

经归队^①，问题已经消除，这一重大情况肯定立即报告给联队长了，为何联队长牟田口仍然命令森田彻‘可作断然处置的姿态进行交涉，为此，适当地派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与冀察方面调停委员同时进入卢沟桥东门内，第三大队主力则集结于卢沟桥火车站西南方附近，做好随时可开始战斗的姿态’？^②‘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他们要进城做什么呢？这是否在执行一项日军必须进入卢沟桥城，有理由要进，无理由也要进，“必要时”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的计划呢？

7. 陆军作战史》记载，7月8日凌晨4时，日方代表寺平忠辅和中方代表王冷斋等到达“一文字山”（即沙岗）日军阵地，关于是否同意日军武装进城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就在这时，一木大队长向联队长电话报告和请示：“午前3时25分听到龙王庙方向三发枪声，中国军队第三次开枪，纯系敌对行为，请示应如何处理。”^③这“三发枪声”如果真有的话，一木为何不向当时在现场负责调查使命的中方代表提出，而是直接报告联队长请求开战？

8. “一士兵失踪”是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的主要理由，但事后日方负责人松井太久郎、寺平忠辅等矢口否认曾提出过此事。如果当初没有提出搜寻“失踪士兵”问题，日军又有何理由提出进卢沟桥城的要求呢？

① 见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上的发言。

② 日防卫研究所：《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2页。

③ 前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32页。

五

这一系列反常现象和强辞夺理都告诉我们,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军队是在强制执行一项既定的占领计划。这一系列反常现象如果不从“计划”的角度来看待,是完全说不通的。已经发生的种种事实逼使我们把当年日军的行动看成是一个事先精心策划好的阴谋,他们是按“计划”行动的。当然,历史问题的研究需要实证。但对于“实证”,也不能过于钻牛角尖,如要求必须某一件特定物证,或必须某一个特定人证,否则就全盘否认。就说卢沟桥事变,要求必须拿出“策动文书”,或必须有花谷正之类的人物出来承认,否则就全盘否认日军策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这都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现实事物是复杂的。现在虽然尚未发现这份“计划书”(有没有也不知道),也未见有日本旧军人出来揭露策划详情,但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肯定有一个策划过程。这是有大量历史资料可以证明的。我认为,在现在已知的历史资料中,能够证明日军有“谋略”的资料比强辩他们“无谋略”的资料更有力更充分。安井教授完全不顾及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而把一系列按既定计划采取的行动和计谋败露后蛮横提出的无理要求,都从整个事件过程中分离出来,让它们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事件。“10时40分的枪声”是一个事件,“3时25分的枪声”又是一个事件。前一次“枪声”与“一士兵失踪”进城要求没有联系,后一次“枪声”与森田彻、寺平忠辅胁迫王冷斋等要求武装进城,被王拒绝也没有联系。而且,他在论证中只选用日本军政府文件和旧军人的表面说法,而不论该说法是如何强辞夺理与事实杆格不通,同时,对能够有力地证明“有计划”的史实却提也不提,这就使他的“偶发”结论显得偏差太大,无法让人接受。我认为,这是安井教授研究工作的主要失误。

安井第2项观点说：“日军在卢沟桥事件前有过‘武力占领华北计划’；有武力占领华北的构想。”（第106页）这句话包含着怎样的意义呢？这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空洞的想象，不是一个将来才去实现的远景规划。在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就制定了明确的要把华北“分离”出中国的《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8月11日下达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即时指导日本在华北的“分离”工作。9月15日，日参谋本部制定出目标针对华北的《对华时局的对策》，要点是：“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时，中国驻屯军应果断立即给以惩罚。”^①1937年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作出能够体现日本外交方针实质的《关于对华政策对陆军省的意见》，要求对华北的工作“奋起直前，采取一切手段，向互助共荣之目标迈进”。其“要旨”说：“在实行以上工作后，仍不能调整日华关系或更加恶化、真的到了不得已时，经过最大的忍耐后，准备给予致命的痛击。”^②4月16日，日本四相会议又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指导的重点是：“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并有助于获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③它并且提出许多具体项目，要求“应迅速设法解决”。^④这些对中国华北的“处理纲要”都是在日本政府、军部多次派员赴中国调查，广泛搜集在华日军、特务机关、驻华外交代表的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后制定出来的。它们不仅代表了日本政府赤裸裸的侵华意图，而且反映了在华日军的立即采取侵略行动的强烈要求。它们包含着对日本华北驻屯军1937年工作目标的——日本独占华北，使

① 前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81页。

② 前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10页。

③ 前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13页。

④ 前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14页。

之成为侵略中国的“又一个”基础地区；它给出了采取武力行动的条件——“情况更加恶化”；“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并且对于行动的后果给予保证——对中国“给予致命的痛击”。我们承认，这些《处理华北纲要》不是7月7日夜事件的“计划”，但人们更不得不承认，7月7日夜“计划”正是在这些《处理华北纲要》指导和鼓励下谋划出来的。向日军“射击”，致使“威武”的皇军“一士兵失踪”；这还不是“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吗？这些《处理华北纲要》为日军策划卢沟桥事变提供了行为动机，启发了“谋略”的思路，不能等闲视之。

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因不堪在华日本人的纠缠，于1937年5月初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躲避。使华北日军在贯彻执行其军部、政府的《处理华北纲要》工作失去了主要交涉对象，陷于停滞状态，而日军中的那些狂热分子（主要是驻屯军司令部参谋班成员）不能安于这种停滞状态。他们在年初对日政府把“分离”华北工作由公开改为隐蔽就表示不满，认为是“软弱政策”，“采取软弱政策的结果，只会使现地形势逐步恶化”。^①提出“莫如以开战来整顿一切战备，和指导适应国际形势的外交，乃为良策”。^②他们要用“谋略”手段制造一个事件，一可使宋哲元回平，二可促进华北问题解决，三可提供驱逐二十九军出平津的机会，达到独占华北的目的。

华北日军在5—6月有第二期训练任务，开始日期不详，但终止日期是7月7日夜，7月10日开始接受检阅。^③这个第二期训练计划当在4月下旬制定出来。我估计，受日本政府《第三次处理华

① 前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15页。

② 前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16页。

③ 见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纲要》(1937年4月16日)压抑的华北日军中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这个第二期训练计划作出之后,在平津某地肯定有过一次关于“谋略”的会议,确定7月7日夜为实施“谋略”的日期。

我的这个估计不是空穴来风,这个准备模仿1931年柳条沟事件的“谋略”消息很快传到东京。日本驻北平陆军副武官今井武夫回忆说:

据事后所闻,当时在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当中,私下谈论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①

听到这个消息的还有日本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长佐藤贤了,他在《东亚战争回顾录》中说:当时东京传播着“第二个柳条湖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②此外,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社长松本治重也听到这个消息。他在事变前6天即7月1日拜访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询问此事,桥本回答:

我们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些企图浑水捞一票的商人们唯恐天下不乱。现在天津是谣言飞舞,甚至有人说在7月7日就会出事。^③

不同的人听到的时间都是“7月7日”,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个传言在东京和华北日本人中间流传的时间,当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它惊动了日本军政领导层,他们纷纷秘密派出人员到华北考察。6月18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派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到华北,“因为石原担心华北会突发事变。这次旅行是为警惕发生第二次柳条湖事件”^④,“重新传达已作指示的中央方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

② 转引自陈在俊《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和背景》,《近代中国》(台北)第41期。

③ 转引自陈在俊《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和背景》,《近代中国》(台北)第41期。

④ 前引《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页。

针,并严格指示不准采取谋略行动”。^①这个冈本扮演的角色有点像九一八事变时的建川美次。1931年9月15日,已经风闻关东军石原莞尔等人要搞“谋略”的日本内阁,质问陆相南次郎,于是军部派作战部长建川去沈阳调查“制止”。岂知建川是支持“谋略”的分子,他动身前先给石原发电报:“计划已经暴露,要提前开始行动。”于是石原等人决定把计划执行时间由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即建川美次到达沈阳的前一天。冈本可能不是华北日军第一次“谋略”会议参加者,但他到平津调查后,知道了“谋略”的全部内容,却没有如实向日本政府报告,而是说了谎话,掩盖了这个策动事变“谋略”的存在。他在回国报告中说:

在中国驻屯军参谋中正进行战争谋略的传说,纯属虚构,无需担心。

中国驻屯军虽无故意制造事端的企图,但鉴于日中矛盾正在加剧的事实,预料中方或将挑起某种事端,因而正在考虑一旦有事断然采取相应措施的准备。^②

冈本无意中给出了参与策划7月7日事件的主要人员——华北驻屯军参谋班,而且把准备实施的“谋略”主要内容透露出来,嫁祸于中方“挑起某种事端”,日军采取“断然措施”。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中方放枪”、“日兵失踪”、牟田口命令森田彻“断然处置”等等。

躲过了日本政府的追问以后,在7月7日以前,这些阴谋分子应该召开第二次“谋略”会议,确定执行发射“第一枪”和“失踪士兵”任务的中队和人选。按照训练计划,他们排出了7月7日夜在卢沟桥城外实行夜间演习的中队是清水节郎的第八中队。“谋略”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清水节郎肩上。(放“第一枪”的人不露面,执行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② 前引《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97页。

人不详)清水经过考虑,决定挑选入伍才3个月的新兵志村菊次郎黑夜听到枪声后向宛平县城走去(这个任务极可能是去受辱或送死,这也许是不选老兵的原因吧)。这个第二次“谋略”会议肯定是有,参加人员除驻屯军参谋班外,应该还有“谋略”主要执行者一木清直和清水节郎。第一次“谋略”会议商定的是“计划”内容,第二次“谋略”会议确定的是“计划”实施。^①这都是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前必不可少的步骤。就是在这样的“谋略”安排下,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我们只有循着这样的思路才能解开卢沟桥事变前后在北平和东京两地发生的所有谜团,才能解释清楚安井三吉教授提出的日军那些反常行为的背后原因,才能看清卢沟桥事变的历史真相。

六

关于日军中那些策动卢沟桥变变的阴谋分子为何至今没有一

① 安井教授质问我:这里假设曲先生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又是谁在认识到志村将被中国兵杀害的情况下演出“失踪”这一幕的呢?是中队长清水,还是志村的直接上司野地小队长?这两人理应是参与“谋略”者。第八中队有约150名士兵,同“谋略”有关的仅仅是清水、野地、志村三人吗?上到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下到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又是在哪里以什么方式策划“谋略”的构想,并决定在7月7日实施的呢?志村是1937年3月入伍的,把“谋略”“发端”这样重要的任务分派给刚入伍不久的二等兵又是怎样考虑的呢?(第120—121页)

这里我再明确一下我的看法:石原莞尔虽不是“谋略”策划者,但他知道(听说过)卢沟桥事件“谋略”。清水节郎是“谋略”后期参与者,具体行动执行者,相当于柳条湖事件中的川岛正。野地伊七是“谋略”局外人。他是事后看到人们对事件如此重视,也跟着瞎说,他的回忆录没有一句真实有用的话。志村菊次郎是受骗者。正因为他是新兵,不懂军中奥秘,才能被派去送死。如是“谋略”的中坚分子,此计划肯定成功。

人站出来坦白承认的问题,安井教授反对我的看法,他说:

卢沟桥事件当事人在事件发生后一年即1938年6、7月间就有关卢沟桥事件作了大量的发言。他们不是一般的说说而已,而是向陆军军官俱乐部偕行社创办的《偕行纪事》投稿,参加同行座谈会就事件进行堂堂正正的发言。虽然不能说他们叙述了事件的所有情况,但从中可以看出,卢沟桥事件当事人和柳条湖事件当事人他们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是完全相同的,根本不存在左右发言的因素。关于这点,曲先生的看法是不得要领的。(第124页)

我觉得,安井教授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化以后的强暴性和舆论机关附和侵略战争的主动性都过于美化,对当年日本军人的军国主义狂热情绪和战时的言论统制也重视不足。这里介绍两则史料供安井教授参考:

战争一开始,批评战争的势力固不待言,连有批评可能性的组织和对协助战争抱消极态度的人全部成了镇压的对象。早在1936年7月,山田盛太郎、平野义太郎等讲座派的学者,宫本百合子、洼川稻子等无产阶级作家等不搞政治活动而只进行合法的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都被捕了。

当时只要不肯誓做战争合作者的,不论其立场如何,都被打上共产主义者烙印而逮捕。工会、农民组合以及稍微带有反战反体制倾向的都成了镇压的对象。^①

具体到禁止揭露卢沟桥事变是“日军计划”的言论统制问题,日参谋本部川本芳太郎中佐在安井所举例的1938年6、7月间朝日新闻社举办的“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到过此事,他说:

^① 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0页。

中方勿庸置疑,第三国也认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有计划挑起的。事变发生后,我由东京来到天津,问过:“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日军一手挑起的吗?”人家告诉我,如是日本一手挑起的,日本将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绝不是日军有计划干的。^①

我想,这该不是我‘不得要领’吧。

七

在本文写作初步完成以后,又读到安井三吉教授为《卢沟桥事件》香港中文版所写的《补论》。《补论》的主要篇幅仍然是反驳我的。首先,我对安井教授研究问题锲而不舍、挚着于学术的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这几年,我受教于安井教授之处颇多,他推动我对一些难点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使卢沟桥事变史中过去模糊含混的问题得到了澄清,而这些问题的澄清,不仅揭露了日本某些仍站在旧立场上的史学家们利用这些问题所制造的“中共计划”说、“第二十九军偶发”说等等的虚伪性,而且使当年华北日军用“谋略”手段制造卢沟桥事变的真相也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当然,我们至今还没有拿到这个“谋略”的文书和证言。我认为,“文书”不一定有,当时日军有第二期训练计划,“谋略”就附在这个训练计划里,也未可知。而当事人不肯出证言,情况很复杂,我过去对此曾做过一些分析。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当事人不肯出庭,难道历史就不能对他做出判决吗?

安井教授反驳我的主要之点,是说我力主“日军谋略”说,那么参加“谋略”的到底是哪些人呢?我过去文章中曾涉及上自参谋本

^① 中译文见《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第2期,第41页。

部、华北驻屯军,下至第八中队的中队长、小队长、士兵,真有这些人吗?其次,清水、野地等多人所做关于‘第一枪’的证言,不能都是‘胡说八道’吧?再次,如是日军‘谋略’,‘应该是规模更大,且进行充分准备的吧’,‘可是,‘第一枪’以后,日军的行动规模小且缓慢,卢沟桥事件时,中国驻屯军的行动与柳条湖事件时关东军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①

这些问题,多数我已在本文前面相关地方做了回应,现在有必要就后一个问题再谈一下我的看法。

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对于它们的同与不同,我在《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证》第4章第4节曾有较详细的论证(见该书第160—162页。其中第160页倒4—3两行为误排,当删),已经回答了安井的疑问。这里要指出的是,安井说,“‘第一枪’后,日军的行动规模小且缓慢”,是不符合实际的。7月8日晨5时30分日军炮轰宛平城,引发中国守军抵抗以后,还未过两小时,日关东军即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派出两个混成旅团及空军去华北,日驻朝鲜军则决定派出第二十师团增援华北。8日深夜,日陆相杉山元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原定应于7月10日复员的士兵延期复员。11日,日内阁会议决定向华北派出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并发表《派兵声明》。^②这样大规模的增兵,无论数量和速度都超过了九一八事变。“规模小且缓慢”,不知从何谈起?难道是指现地日军第一联队和第三大队没有一举攻占北平和宛平城吗?但这首先要看在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的情况下,华北原有日军有无这样的能力。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奉命“不抵抗”;日军行动当然规模大且神速。但到1937年的卢沟桥,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尽

① 安井三吉:《卢沟桥事件》(香港版),第230页。

② 前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38—151页。

管华北日军行动也相当神速,7月8日凌晨1时半,即丰台一木大队长尚未赶到卢沟桥阵地时,天津的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已主持召开了幕僚会议,命令在天津的各部队于8日3时做好出动准备,并于7时30分下达了出动命令。出动的部队除步兵外,还有战车一个中队,炮兵一个大队,并决定卢沟桥前线战事由旅团长河边正三坐阵指挥。^①但中国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如果不是第二十九军高层领导人的妥协错误决策,胜负正未可知。可见安井所说的“日军行动规模小且缓慢”,正是当时中国舆论纷纷指出的“缓兵之计”,而不是日本的善心。从这一点看,就更加证明卢沟桥事变和柳条沟事件一样都是日军“谋略”的产物。

再附带说一下,安井教授在《补论》中归纳我的论点第3项不完全。完整的表述应该是:

3. 计划主要是这样的:枪声—志村“失踪”—清水向丰台大队长报告—一木大队出动占领卢沟桥城。

最后一节是计划规定要达到的目的,是关键,不能遗漏。以后日方的交涉理由变了,但目的始终未变。

(作者曲家源,1936年生,山西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前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34页。